本版编辑：曹颖新　E-mail:wenshiban@hotmail.com　Tel:010—62806236　　2015年5月25日

中外制度史

宋代台谏与制衡的制度

□张　军

近来读《宋史》，颇有感于宋代的士大夫对皇权之制衡。

我们知道，宋建国后，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末五代王纲解纽，武将跋扈，遂推行以文治国的国策。用天下之士人，以易武臣之任事者，故儒道之振，优于隋唐。史称宋之政治，为士大夫政治。

宋朝的士大夫政治

士大夫政治之基本内涵包括两方面：一是优礼士大夫。“满朝朱紫贵，尽是读书人”“宰相须用读书人”“待士大夫有礼，莫如本朝。唐时风俗尚不美矣”，这样的记载在史籍中俯拾皆是。最为关键的是，皇帝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。史言，宋太祖有誓约，刻之于碑，藏之太庙，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，违者不祥。誓碑有无暂且不论，其基本精神却是贯彻执行的。二是与士大夫共天下。太祖皇帝有言，设科取士，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。宋神宗时，大臣文彦博也言：“与士大夫治天下。”南宋陈渊又言：“夫士大夫，天子所与共理者也。”后来，“共治天下”的理念经士大夫进一步发挥，阐释为“共天下”。宋度宗时，更有臣僚言：“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，非人主所可得私也。”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，天下之事不能由皇帝独裁，要与政府即士大夫共同商议裁决才能治理好。暗示着天下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有的天下。

士大夫政治如何对皇权加以制衡呢？措施有二：一曰理念，二曰制度。

制衡的理念

先看理念。隋唐一统，鉴古思治，但思想界是儒佛道兼重。“佛，日也。道，月也。儒，五星也”，儒学并非主流意识形态。安史之乱后，唐人“气骨顿衰”，思想界遂有巨变。唐中期至宋，就儒学而言，受佛道二教趋向心性理论建构的风气影响，亦有三大变化：一是治学方法从注疏传习转向义理探求；二是研治重心由外王转向内圣；三是清理儒学史，创立道统。自此，“道”作为儒家的最高追求便悬置在日常政治之上。道统高于政统。如何实现“道”？路径就是国家之君主与士大夫阶层师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政。为了实现“道”，为了让国家政治臻于大同，君主必须与士大夫合作共同努力。所以在“道”的面前，君主与士大夫是平等的合作关系。这即是宋代“与士大夫共天下”的理论基础。宋代士大夫国家政治主人翁的角色意识和使命感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强烈，更体现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儒家精神。程颢曾与宋神宗一起讨论人才问题。宋神宗当时感到人才不足，表示：“朕未之见也。”程颢当场指责道：“陛下奈何轻天下士？”宋神宗马上“耸然”连声道：“朕不敢！朕不敢！”又如高宗曾明确说道：“朕学问安敢望士大夫！”有自知之明，不敢妄自尊大。在士大夫眼中，皇帝专权，大臣诺诺，此乃不正常现象。因而，士大夫要与皇帝共享治权。

制衡的制度

再看制度。一曰台谏制度。台谏者，御史台和谏院也。台官和谏臣通呼为台谏官、言事官或言官。宋人常常将台谏与君主、宰执三者并举，揭示台谏在中枢机构中举足轻重之地位。后人也称“宋之立国，元气之台谏”。儒家意识形态要求士大夫须道德自律，以社稷生民利益为重。宋代确有不少敢于谏诤者，以信念为精神支撑，“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”，使台谏系统正气凛然、威慑人心。而宋代皇帝在被“批龙鳞”“犯天颜”之际虽时有震怒，多数情况下允许甚至鼓励直言。如宋太宗不仅多次鼓励臣下直言，并将左、右补阙改为左、右司谏，左、右拾遗改为左、右正言，立此“新名”，“使各修其职业”，从制度上增强谏官的监察机制。士大夫们认为，皇帝是人，不是神，也会犯错误。犯了错，就该批评。宋太祖曾迷惑于一女色，在群臣批评后决意摆脱，竟借该女熟睡之际亲手杀害。韩琦在审阅《三朝圣政录》时发现此事，大为不满：“此岂可为后世法！己溺之，乃恶其溺而杀之，彼何罪？使其复有嬖，将不胜其杀矣。”遂删去。毫不客气地指责宋太祖不能自律和滥杀无辜。宋宁宗初，皇帝“今日出一纸去宰相，明日出一纸去谏臣”。士大夫们感到不妥。监察御史吴猎便上书，“谓事不出中书，是谓乱政……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，而用舍之间，为是轻易快意之举”。宋仁宗曾直接行使司法权，近臣有罪，不交司法部门审讯判决。谏官王贽挺身而出，指责道：“情有轻重，理分故失，而一切出于圣断，前后差异，有伤政体，刑法之官安所用哉？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。”面对士大夫的直言极谏，仁宗还是很在意的，即言：“台谏之言，岂敢不行！”宋人屡有谏人主易、言大臣难的议论，表明了皇帝纳谏、士大夫敢谏的良好政治风气。

二曰封驳制度。此制唐代就有，至宋更为典型。一般来说，国家政枢的运转是皇帝与宰执等重臣群议，定下方针政策后，由秘书部门起草诏书，再交有关部门审核，之后再付诸实行。但是国家大事甚或皇帝私事并不都是由众臣议论而定。尤其是对一些并不合适的旨意，如何加以处理？这在公文制度上的体现，即所谓封驳制。封驳，简而言之，就是退还诏书，拒不执行皇帝意旨。封驳制的实行，显示了士大夫阶层高度的责任心和斗争精神。试举一例。宋理宗时，右司谏李伯玉因言事降官，舍人院逾年不草诏颁布。至牟子才兼直舍人院，换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斗争，所起草的贬官诏书，用的却是赞扬之语，目的在于为他将来官复原职做准备。宋理宗当然不愿意，劝告他“可更之”，牟子才不同意。宰相也来劝说，牟子才凛然道：“腕可断，词不可改！丞相欲改则自改之！”皇帝、宰相竟无计可施，只得罢休。士大夫的缴诏封驳行为，制止了皇帝轻率或荒唐的旨意，在一定范围内，有效地约束了皇权。

三曰史官制度。史官主要记录皇帝的言行，将其编成起居注、时政纪、实录，最终载入正史，传之千秋万代。元丰年间，吕公著上书宋神宗告诫道：“人君一言一动，史官必书。若身有失德，不惟民受其害，载之史策，将为万代讥笑。故当夙兴夜寐，以自修为念。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，虽小善不可不行，在小恶不可不去。”在具体的朝政中，士大夫常以此来警告皇帝。宋神宗任用宦官李宪主持陕西边防，邓润甫即上书道：“岂可使国史所书：以中人将兵，自陛下始？”宋哲宗时，征收五谷力胜税钱，苏轼上书请求废除此法，说道：“百世之下，书之青史，曰收五谷力胜税钱，自皇宋某年始也。臣窃为圣世病之！”宋太祖时，一位官员称有急事紧急求见。宋太祖正在后苑弹雀。但所奏不过是平常之事，大怒。该官说：“臣以为尚亟于弹雀！”宋太祖更加恼火，举斧砸在他嘴上，打落两颗牙齿。其人缓缓拾起牙齿装入怀中。宋太祖骂道：“汝怀齿，欲讼我乎？”对曰：“臣不能讼陛下，自当有史官书之也！”宋太祖闻听立即表示道歉并赐金帛慰问。

四曰经筵制度。皇帝定期不定期地要接受士大夫的儒学教育，此之谓经筵制度。如何培养塑造皇帝，是士大夫的重要任务，成败与否决定着国家的命运。加强对皇帝的教育，是士大夫限制皇权的又一种方法。年幼的宋哲宗去听课时手折一柏枝玩耍，讲官程颢即时以师尊身份批评道：“方春万物生发之时，不可非时毁折。”宋哲宗闻听，“亟掷于地”。直到下课脸色仍未好转。宋仁宗即是士大夫培养出的一个典型。他6岁受教于资善堂，9岁为皇太子，13岁即位。在位时间最长，凡42年；故而听讲读最勤，受教育最多。史称宋仁宗“恭俭仁恕，出于天性”，其实正是出于儒臣的教育培养；所施为“忠厚之政”，死后定谥被誉为“仁宗”。史官范祖禹总结宋仁宗的丰功盛德“所可见者”有五：“畏天、爱民、奉宗庙、好学、听谏。仁宗行此五者于天下，所以为仁也。”并提出要宋哲宗效法，哲宗深表赞同。可见宋仁宗成为士大夫和皇帝心目中的理想之君。

总之，宋享国三百余年，其政治承自汉唐以来之变化，而又大异之。就于皇权制衡而言，有其自身鲜明特点。不禁念及，对于传统政治文化，时人切莫仅以“专制”等简单词语泯灭其复杂性、丰富性。读《宋史》，难免生此慨叹焉。

有所思

能而不贤的裴蕴坑了炀帝

□陈　良

《隋书·裴蕴传》记载裴蕴“性明辩，有吏干”。这个评价非常准确，综观其一生，不难看出他是一位明察时务、能言善辩、颇有行政才干的能臣，但不是一位贤臣。

裴蕴早年供职于南方陈朝，担任过直阁将军、兴宁令。因为父亲在隋朝为官，并且看到陈朝即将衰落，他暗中与隋文帝通信，请为内应。陈朝灭亡以后，他投奔到隋朝，受到隋文帝特殊礼遇，给他加官晋爵，“拜开府仪同三司，礼赐优洽”。

进入隋朝，裴蕴先后出任洋、直、棣三州刺史，擅长治理，“颇有能名”。大业年间，连续几年考绩，裴蕴均名列第一。隋炀帝听说他很能干，将他调到中央任太常少卿，主管礼仪文艺方面工作。裴蕴揣知隋炀帝喜好声色、讲究排场，便大张旗鼓地扩充宫廷乐府，“增益乐人至三万余”。隋炀帝对此十分满意，随即就让裴蕴出任民部侍郎。

民部负责掌管户籍与财税。在担任民部侍郎期间，裴蕴再次展现出能干的一面。当时，户口管理比较混乱，瞒报、漏报现象很严重。裴蕴做过几任地方长官，熟悉其中内情。为此，他提出一整套核查办法，强化问责与奖励。那一年，“诸郡计账进二十四万三千丁，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二百”。这次人口普查成功，不仅改进了户口管理，而且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。隋炀帝非常高兴，面向百官表扬裴蕴：“前代无贤才，导致户口罔冒。如今彻底核实了，全由裴蕴一人成就。”

得到皇帝赏识，官运自然亨通。不久，裴蕴被擢授御史大夫，与裴矩、虞世基参掌机密，进入核心领导层。御史大夫为最高监察机关长官，其职责是监督纠绳百官过失，地位高责任大。作为御史大夫，裴蕴本应秉公监察司法，可他丝毫不讲原则，热衷于揣摩上意，依此行事。《隋书·裴蕴传》记载了他一件事，足见其表现极不贤良。

杨玄感（司徒杨素长子）因炀帝猜忌大臣，不能自安，于大业九年起兵造反，最终兵败身亡。炀帝命裴蕴追查其党羽，对裴蕴说：“杨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，可知天下人不要太多，多了就会相聚作乱。对作乱者一律格杀勿论，否则不能惩戒后人。”裴蕴领受此旨，知道炀帝只在乎稳定而轻视人命。于是，裴蕴与樊子盖（兵部尚书）以清理杨玄感党羽名义，“专行屠戮，大穷党与，海内豪士，无不罹殃，遂至杀人如麻，流血成泽”。（陈子昂语）总共有三万余人被杀，家产全都抄没，流放人员六千余人。牵涉此案的死难者大都是冤枉的，他们冤死于裴蕴等人的严刑峻法与粗暴执法。

对于裴蕴在御史大夫任上的所作所为，史书做出这样的评述：“蕴善候伺人主微意，若欲罪者，则曲法顺情，锻成其罪。所欲宥者，则附从轻典，因而释之。是后大小之狱皆以付蕴，宪部、大理莫敢与夺，必禀承进止，然后决断。蕴亦机辩，所论法理，言若悬河，或重或轻，皆由其口，剖析明敏，时人不能致诘。”由此可见，裴蕴在履职上存在诸多问题：首先是迎合领导意愿，以领导好恶为好恶，以领导满意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，为此不惜扭曲法度；其次是大包大揽，干预宪部（刑部）、大理寺等机关独立司法，直接插手断案；再次是巧舌如簧，以言代法，弄法律于口舌之间。

孔子云：“为政以德。”何谓之德？亚里士多德认为，公正原则是政治学的最高准则，构成道德美德之顶峰的便是公正，“政治上的善即为公正”，公正则依归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。显而易见，裴蕴一味迎合领导，而不能恪守公正原则，是缺乏政治道德的表现。也许在他看来，天下乃皇帝之天下，故而只需讨好皇帝一人即可。殊不知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。

裴蕴对领导曲意逢迎，虽能讨领导欢心，却让天下人寒心。因为他丧失公正原则，导致司法不公：以言论或腹议定罪，严刑峻法，漠视生命，滥杀无辜，制造大量冤假错案。裴蕴可能以为，自己如此行事，有助于强化皇上权威，是为皇上帮忙。实际上，他是为皇上帮倒忙。正是裴蕴、裴矩等佞臣阿谀奉承，助长隋炀帝不断自我膨胀，日益暴虐专横，不恤民情，从而在官方与民间获得暴君的名声。当民怨、民愤超过一定限度，势必激起民变，大隋王朝很快崩盘。

大业十四年（618年），全国各地硝烟弥漫，滞留江都的隋炀帝再也无法驾驭局面，只能无可奈何地顾影自怜。宇文化及与司马德戡联手发动兵变，逼炀帝自缢身亡，裴蕴亦被杀。对于隋朝灭亡，隋炀帝无疑要负主要责任，而裴蕴等大臣也难辞其咎。能而不贤的裴蕴曲法枉法，终究贻害于国家，既坑了炀帝，也害了自己。

老徽章上的日本侵华史

□孟中洋

战争中最能激励和鼓舞兵士斗志的莫过于军功章。那些历经沧桑的老徽章既是奖励的证明，更是历史的旁证。笔者研究近现代徽章史数十载，在收藏的包括抗战专题在内的各类早期徽章中，既包括表现中国人民英勇奋战的各类军功章和奖章，也有相当部分是侵华日军为粉饰太平、歌功颂德而颁发的“反面教材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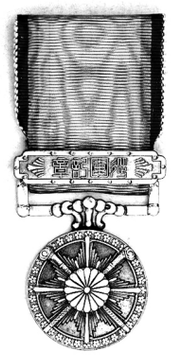
1887年，日本专门制订了侵略中国的计划《征讨清国策》，随后几年又进行大量间谍活动，做好了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。1894年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日本军队渡过鸭绿江，侵占中国的许多城镇。不久又袭击威海卫，摧毁了洋务派经营十几年的北洋海军，占领辽东半岛，迫使清政府屈膝求和。1895年，依据第143号帝国令，日本向参加中日甲午战争的人员颁发了“明治二十七、八年从军纪章”，即公元1894年和1895年。有资料称，徽章系用战争中缴获中国的大炮铜件铸造而成。

19世纪末，山东、直隶等地爆发了义和团运动，列强胁迫清政府予以镇压。1900年5月底，各国驻华使团通知清政府总理衙门，要调兵入京“保护使馆”。随后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进犯北京。8月，北京失陷。八国联军所到之处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1901年9月7日，清政府被迫签订《辛丑条约》。1902年4月21日，日本依据142号帝国法令，向参加八国联军侵华的日本军人颁发了“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从军纪章”，即1900年。

1904年2月6日，日本对在中国旅顺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，持续一年半之久的日俄战争爆发。清政府竟然选择中立，并把辽河以东划为“交战区”，任由中国人民遭受兵燹之灾。1905年9月，战争以沙俄失败告终，在美国斡旋下，日俄签订《朴茨茅斯条约》，日本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，并准备进一步侵略中国。1906年3月31日，日本发布第151号帝国令，向参加日俄战争的人员颁发了“明治卅七、八年战役从军纪章”，即1904年和1905年。



（图1）建设东亚新秩序纪念章↑



（图2）大东亚战争从军纪章→

1914年8月，日本以系协约国成员为名，对德国宣战。9月派兵登陆中国山东半岛，进攻德占的胶济铁路沿线。11月攻占青岛，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。对此，袁世凯政府宣布“局外中立”，听任日本践踏中国主权。在随后的二十余年里，日本继续把中国作为扩张的重要目标，先后迫使袁世凯接受了丧权辱国的《二十一条》，通过巴黎和会取得了“德国在胶州及山东所有各项权利”。1915年11月6日，日本发布203号帝国令，向在华对德作战及参加太平洋岛屿战役的日本军人颁发了“大正三四年战役从军纪章”，即1914年和1915年。之后，日本又依据1920年11月6日第203号帝国令，向参加一战包括参加青岛作战的日本军人颁发了“大正三年乃至九年战役从军纪章”，即1914年至1920年。

1931年9月18日，九一八事变爆发，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、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。随后，日军北上南下，经过四个多月作战，以武力占领了东北全境，并相继发动了向长城沿线及察哈尔等地的进攻，战事延至1934年。1934年7月28日，日本依据第255号帝国令，向参加上述侵华战争的日军颁发了“昭和六年乃至九年事变从军纪章”，即1931年至1934年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日本鲸吞了比其本土大近两倍的东三省，1932年2月，扶持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。之后扩张野心日甚，把矛头直指华北地区。1933年1月，占领山海关。2月下旬，日本试探性向热河省的承德、赤峰等地进攻，中国守军一触而溃，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临阵脱逃。日军兵不血刃，于3月4日进占承德。3月上旬，攻占赤峰、围场、全宁等地，热河全省沦陷。为炫耀胜利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向“有功”人颁发了这枚“热河讨伐功劳章”。该章被设计成战马与马蹄掌形状，并有日本国旗与伪满国旗标志，强悍的战争象征意义极强。

1933年以后，日本以东北为跳板，不断蚕食华北地区，并为全面侵华作了一系列周密部署。1937年7月7日晚，七七事变爆发，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由此全面展开。1939年7月27日，日本发布第496号帝国令，向侵华士兵颁发了“支那事变从军纪章”。“支那事变”即指七七事变。
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1937年7月底，日军攻占北平、天津，随后调集兵力，扩大在华北地区的作战。中国军队尽管进行了英勇抵抗，但无法改变战场整个态势。半年之内，华北五省沦入日军之手。当时日军华北派遣军向所属部队颁发了“北支慰问纪念章”，整个章面设计为一只日本传说中象征勇武的金鸱鸟，踩在中国长城之上，充斥着侵略者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日本妄图短期内一举摧毁中国的方针以失败告终。鉴于此，日本调整侵华政策，在政治上提出“以华治华”，积极培植汉奸势力。先后建立了伪满洲国、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傀儡政权。1938年11月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臭名昭著的《东亚新秩序》声明，宣称“帝国所希求者即建立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秩序，此次征战的最终目的即在于此。此种新秩序的建立，应以日、满、华三国合作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”。近卫声明的发表，表明日本企图以此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抗战立场，达到不战而胜的最终目的。其实质是日本要独霸中国东北及更广大地区。为配合这一策略，日军颁发了“建设东亚新秩序纪念章”（图1）。章面以日本、伪满和伪临时政府国旗组成。

在政治上拉拢的同时，日本在经济上实行“以战养战”，强化对中国的殖民掠夺，以用补充因战争对本国资源的极大消耗。这种掠夺是全方位的，涉及土矿业、农业、商业、金融业等各个领域。日本专门作出了“强化南京政权”的决定，并授意汪伪政权设立了“全国商业统制总会”，负责对米粮、棉花、粉麦、油粮及日用品实际严格的“统制”和收购、配给，为日军的物资供应提供保障。“下塘集社区物资统治配给组合证章”即是当时所颁发，此章中心为日本国旗与汪伪国旗并列的图案，有力地佐证了上述史实。

1941年6月，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，苏德战争爆发。进一步加速了日本在南进和北进问题上的最终抉择。7月初，经过反复权衡，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《适应局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》，决定“不论世界形势如何演变，帝国均将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指针；帝国依然向处理中国事变前进，并以确立自存自卫为基础，跨出南进的步伐……为达到此项目的，不惜对英美一战”。这次御前会议最终确立了日本的南进国策，迈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，与美英直接交锋的第一步。12月8日，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。之后，宣称从事的是为驱逐白人殖民者、解放亚洲的圣战，并将整个战争称为“大东亚战争”。根据1944年6月21日发布的1417号帝国令，日本制颁了“大东亚战争从军纪章”（图2），向参战人员颁发。但该章在日本投降前仅在大阪制作1万枚，盟军占领日本后，模具被全部销毁。

这些侵华日军发行的军功章和徽章，已将他们自己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也给每一名充满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中国人以深刻警示：牢记历史，勿忘国耻，发奋图强，振兴中华。

史镜

中华“和”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

和然可敬



作者：李铁



作者：阿朗一笔